

就医地目录
参保地待遇
就医地管理

跨省异地就医 享受这些待遇

本报讯 记者羊荣江 通讯员童伟宏报道 2月24日,我省省级医疗保险服务中心联合杭州市医疗保险管理服务局,在杭州火车东站候车大厅开展了一次跨省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广场宣传活动。

该活动主要展示跨省异地就医工作进程和就医相关政策,进行现场咨询,发放宣传折页等,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参保人了解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政策要点、经办流程等内容,更好地惠及广大群众。

2017年6月16日,我省71个异地就医结算区、54个信息系统的和207家异地定点医疗机构全部接入国家平台运行,提前3个半月完成国家部署的任务。

目前,我省跨省异地就医系统运行平稳有序,直接结算人数不断增加。截至2017年

12月31日,外省在浙江发生跨省异地就医有效结算共计3201人次,总费用6255.66万元。浙江在外省发生跨省异地就医有效结算共计9669人次,总费用2.7亿元。

据了解,跨省异地就医主要惠及4类人群。常驻异地工作人员,指用人单位派驻外省工作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指在外省居住生活的人员;异地安置退休人员,指退休后在外省安居并迁入户籍的人员;异地转诊人员,因当地医疗机构诊断不了或者可以诊断,但是治疗水平有限,需要到外省就医的患者。

按国家统一政策,参保人员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主要有三个环节,一是在当地医保经办机构备案,二是选择全国跨省异地就医定点医院,三是凭本人社会保障卡

直接结算。待遇标准按照“就医地目录、参保地待遇、就医地管理”享受。

就医地目录包括基本医疗保险的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服务设施的标准。参保地待遇是指执行参保地的起付线、报销支付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就医地管理是指就医地经办机构要为异地就医人员提供和本地参保人员相同的服务和管理,包括咨询服务、医疗信息记录、医疗行为的监控、医疗费用的审核等。

据统计,截至2018年1月底,全国所有省份和统筹地区均已接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结算系统,共有360余个统筹地区(参保地)、8600余家定点医疗机构可以实现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其中包括我省71个统筹区以及214家医疗机构。

制假售假人员从浙江等地购进包装盒

你买的杜蕾斯 可能是假的

跨多省制售假名牌安全套窝案调查

新华社太原2月25日电 污水横流的房间内,没有任何消毒等安全措施。一堆经劣质硅油浸泡的安全套放在蓝色桶中,经过布满油污的覆膜机为它们添加外包装,这些安全套摇身一变,成了杜蕾斯、冈本等知名品牌产品。

近期,记者接到爆料人的信息后展开调查,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了解相关信息,一起涉及国内多省市、形成了“产业链”,主要通过网络销售,案值超过500万元的制售假冒知名品牌安全套案件浮出水面。

跨省采购设备、包装,黑作坊源源不断生产假冒知名品牌安全套

“网上和部分实体店铺销售的一些知名品牌的安全套,有些实际上是假货。”日前,记者接到一位湖北籍知情人士爆料,一些假冒的品牌安全套,正在流入市场。

通过调查,并从公安机关了解到,部分制售假人员,从购买设备、加工、包装再到售卖,正在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其中,在山西,2017年年底,一条线索被转至运城市公安局盐湖分局。这一线索显示:王某、陆某等人在运城盐湖非法加工、销售假冒杜蕾斯、冈本、杰士邦、诺丝等注册商标的安全套。

“这并非一起普通的制售假货案。”盐湖分局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队长石进忠介绍,经过调查,警方发现,案件涉及地域广泛,涉案人员多,其中有6个窝点被锁定。

经过一个多月的蹲守、研判后,日前6路警方同步开展了抓捕行动。警方突袭时,部分制假人员仍在把已经覆膜的安全套装入各色包装盒中。

石进忠介绍,初步调查显示,王某等人从浙江等地购进

包装盒,从河南商丘、郑州等地购进安全套生产、包装机器,将裸套倒进装有硅油的桶中,浸泡后捞出来放在覆膜机上覆膜,再以每包装1盒给1毛钱的加工费的方式,从附近雇佣村民进行包装。

警方锁定的6个窝点,共查获了两套覆膜机、封口机等机器,还有170多只已经用覆膜机加工好的安全套,其中大部分已经装盒、装箱。此外,警方还查获了约27万只安全套裸套,抓获涉嫌构成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罪的王某、陆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

成本几角钱售卖数十元,高利润催生跨省制售团伙

制售假名牌安全套的人,是如何形成“上下线”的?记者调查发现,其中有“网友”在线联系,也有哥哥带弟弟入行,还有孕妇参与其中。

被警方抓获的王某,今年32岁。2016年,王某在网上聊天时认识了河南籍加工、销售假安全套的女子杜某。杜某得知王某近年一直从事网络销售工作,提出聘请王某为她销售产品,给他月薪3000元加提成,并以郑州严查假名牌安全套为由,提出把加工设备搬到郑州。同年10月,王某通过朋友陆某在一个村子找了处院子,安置机器。此后,陆某也加入进来。

办案民警张丰胜介绍,2017年3月,王某把比他小两岁的弟弟带“入行”。兄弟二人,都大学毕业。

王某称,他们和杜某主要通过微信、QQ联系,确认要货时间、种类、数量、价格等。截至被抓获,他为杜某销售的假冒知名品牌安全套共约10万元货款,他的工资加提成约2万元,销售渠道既有微商、微信、拼多多、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也有部分线下成人用品店。

警方顺藤摸瓜,锁定了住在上海的24岁的黄某。“杜某”是她对外联系的化名。2月上旬,警方在河南郑州对黄某及其丈夫实施抓捕。

经审讯,怀孕临产的黄某承认自己就是与王某联系的“杜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与王某兄弟等人供述基本一致。

目前,警方正在对此案进一步侦查。按照犯罪嫌疑人供述,1盒3支装的假冒名牌安全套,成本价仅0.42元,在市场上可以卖到10多元到数十元不等,利润惊人。

制假售假屡打不绝,斩断“产业链”需综合施策

制售假冒知名品牌安全套,俨然已经形成“产业链”。黄某称,在向下发展王某等“下线”的同时,她用于制造假冒安全套的机器、半成品安全套大多来自河南新乡、商丘等地的“上线”。

多位参与办案的民警认为,制售假冒知名品牌安全套之所以屡打不绝,一方面,是因为利润较高,使一些人铤而走险;另一方面,加工窝点多租用民房,售卖行为主要通过网络平台进行,隐蔽性相对较强。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国华认为,互联网时代,借助网络渠道,假冒伪劣产品销售的范围更广,容易造成的危害更大、影响更广,这也对政府部门的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涉及公安、工商、网络监管等部门,应该加强协调、综合治理,形成合力。”

王国华说,针对一些屡打不绝、屡禁不止的制假行为,还应该探索跨地区的交叉执法机制,通过信息情报共享、跨区域交叉联动,彻底清除相关“产业链”。

椒江投资300多万 建公益流浪犬收容中心

本报讯 记者潘仙德报道 日前,台州市椒江区划出近5亩土地,投资300多万元,建成了全市首家公益流浪犬收容中心,并举办了首个流浪犬领养日。

近年来,随着宠物犬被主人弃养和自然繁殖,流浪犬数量不断增加,既影响了城市的环境卫生,又带来了人身安全甚至是疫病传播等一系列问

题。对此,椒江以“政府搭台、民间唱戏”为收容管理模式,规划出了4.9亩土地,并投入311.172万元专款用于流浪犬收容中心建设,还每年从财政拨出60万元用于流浪犬收容中心的运行经费。

政府出资建设流浪犬收容

中心,不但解决了流浪犬的伤人问题,还解决了这些流浪犬的归宿问题。据了解,对流浪犬将按照“集中收集、严格准入、严控数量、规范领养、文明处置”的原则进行运作,分为隔离观察区和养犬领养区两大功能区块,隔离区由主管部门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管理,养犬领养区与爱心人士团队合作运行。目前,椒江区公益流浪犬收容中心已收养了320多条流浪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修改宪法 部分内容的建议

(上接第1版)

十五、宪法第八十九条“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中第六项“(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修改为“(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第八项“(八)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修改为“(八)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等工作”。

十六、宪法第一百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报本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十七、宪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中“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监察委员会主任、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十八、宪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三款“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

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十九、宪法第一百零四条中“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修改为“监督本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二十、宪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发布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个别代表。”

二十一、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增加一节,作为第七节“监察委员会”;增加五条,分别作为第一百二十三条至第一百二十七条。内容如下:

第一百二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

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

第一百二十六条 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

第一百二十七条 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第七节 监察委员会

第一百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

第一百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任,

副主任若干人,

委员若干人。

监察委员会主任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由法律规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2018年1月26日

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家里没个上学的 根本不知道补课有多贵 数千数万元的费用也挡不住补课热情



补药 凝华作

“家里没个上学的,根本不知道现在补课有多贵!”“听说补课花了这么多钱,别人都不相信,不理解。”不少家长谈到补课费就开始激动。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校外补课,不仅加重了中小学生的校外课业负担,更成为不少家庭日渐沉重的经济负担。

现今网上有句流行语,“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把它用在补课费上,可谓恰当。然而动辄数千、数万元的补课费用,依然阻挡不了家长们对补课的需求和热情。如何为学生减负,为家庭减负?期待政府、社会、家庭等共同发力。

记者了解到,相比以传统升学为目标的补课,以出国留学等为目标的补课费用更是惊人。“送孩子赴美上高中,她花了数百万”,一张网络流传的由“Steve妈妈”提供的图表显示,仅孩子出国前参加英语培训(一对一外教辅导)一项的费用就高达85万元,还不算培养冰球等所谓与国际接轨的爱好的花费。

教育机构教师特别是“名师”水涨船高的收入,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培训机构的丰厚利润。诸葛学堂发布的一则“征婚!大语文老师! 年收入 155-240 万元! 高! 富! 帅!”的帖子显示,这位老师税后年薪超过百万元,还不包括任何期权、股权及奖金等,令人瞠目。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范先佐说,虽然存在地域、城市差异,但

是“补习家教费用”在家庭开支中的份额攀升已非常普遍、值得关注。民进上海市委今年的一份提案显示,通过对部分上海中小学生的问卷调查,有84.15%的孩子参加课外辅导班。

有盲目有无奈,门诊要补价格不菲

记者采访发现,除了数学、英语撑起补课大梁,如今的补课门类丰富多样,几乎每门功课都有庞大的补课群体,积少成多,在分割孩子空闲时间的同时,更为家庭经济负担层层加码。

沈阳的张女士最近给小学五年级的女儿报了一个国学班。学费一年1.6万元,一次性交清,每周两个半小时,如果因自身原因缺课费用不退。张女士说,现在“国学热”,这个班在沈阳小有名气,尽管费用昂贵,家长还是趋之若鹜,托了人,还得通过入门考试才报上了名。除了国学,周末、假期的补课内容还包括奥数、英语、声乐、美术、羽毛球……每年各种补课费用约6万元。

根据沈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7年统计,2016年沈阳市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7444元,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仅补课费就相当于当地一个成人的年收入。

张女士说:“这个课也不是非学不可,但是现在高考中传统文化比重增加,还是学得越多越好,孩子从小就要努力,家长也要尽量给孩子创造条件,精力、经济都要跟上。”

北京的王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孩子5岁开始学舞蹈,每个学期15次左右的大课5000元,寒暑假集训也得四五千元;而重头是小课,各种表演、艺术节前好一支新舞,哪怕是请最普通的教“一对一”,也得私教十几个小时、花上几万块钱。

当被问到为何不在少年宫或学校学时,王女士表示:“学校的音乐美术等艺术类课程孩子都不喜欢,而学校舞蹈队训练难度低、强度小,可能从安全角度考虑,基本功连下腰都不练,还经常碰到老师开会等原因停训,很多孩子去是因为放学没人接送,把舞蹈队当‘托管班’。至于少年宫,一是不好报名,二来又远,所以根本没法考虑。”

标本兼治,莫让费用和焦虑齐升

2018年,教育部将探索建立

“负面清单”制度和联合监管机制,促进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规范有序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要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精准施策,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重、“择校热”“大班额”等突出问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表示,课外补习正在“绑架”学校教育。

“课外补习在国外称之为‘影子教育’,如影随形跟在学校教育后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尤其是为后进学生提供课外辅导,就是所谓‘补差’的功能。但是在中国,其功能普遍成为‘培优’,越是学习好的人上的补习班越多。”

记者采访发现,中考、高考指挥棒,依然是补习热的主要动力。“考啥学啥呗。”有家长表示,“谁真心愿意花大价钱出去补课啊?”“现在是水涨船高,你不补就肯定落后。”马瑜说,在中考、高考自主招生录取比例可观的现状下,家长们普遍希望为孩子争取“裸考”之外更多的机会,拼竞赛、拼难度,这是补习费用越来越高的重要原因。

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一直关注并反对过度补课现象:“整个教育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家长辛苦苦赚来的钱,都送给了培训机构。”要打破这个怪圈,学校的教学质量是关键,教育部门一方面要严厉查处老师上课不认真,考试超出大纲等现象,另一方面要通过设立标准、执法检查等,规范培训机构的办学。

采访中,也有不少家长表示,虽然补课费用高昂,但校外培训机构无论从师资力量、课程研发、沟通服务等各方面来看,确实弥补了校内教育的不足。我国的教育现状是高中老师水平最高,初中老师又强于小学老师。但是,家长却越来越重视孩子“打基础”,而校外机构不乏把名校毕业、归国的高素质教师,这也是家长对校外机构趋之若鹜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范先佐认为,补课费用日高,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优质的教育资源不仅稀缺,而且资源分配需要更加公平。“问题表现为家庭教育开支剧增,实际指向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应该更公平,高质量教育资源的获取应该更便利、成本更低廉。”

据《半月谈》